

吴豪德
著

回首那些已然远去，却永存心底的蹉跎岁月……

吴豪德文集

► W U / H A O / D E / W E N / J I ◀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回首那些已然远去，却永存心底的蹉跎岁月……

吴豪德文集

► W U / H A O / D E / W E N / J I ◀

吴豪德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豪德文集 / 吴豪德著.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043 - 7759 - 3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6737 号

吴豪德文集

吴豪德 著

责任编辑 李晓霖

封面设计 文人雅士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 - 86093580 010 -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60(千)字

印 张 32.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7759 - 3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吴豪德



1993年12月21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走访致公党中央机关，图为参观政研室



1956年6月，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班部分同学合影留念（吴豪德 摄）



学生拜见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教授



1992年3月27日，在全国政协七届五中全会上，作者做题为《殷望社会各界关心海外学子》的口头发言

作者简介

1934年4月2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万隆市芝马圩镇的华侨世家。在那里生活了整整18年，在动荡不宁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上中学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当时，各种进步书刊源源不断流入，进步思想开始传播到印度尼西亚，在华侨青年和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探求新知识、追求进步和热爱祖国的热潮。

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和影响下，通过学习进步书刊，参加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和投身当地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我的眼界开阔了，开始知晓了世界大事，了解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一个从少年迈向青年的我，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向往着更广阔的天地。于是，在我的脑海里萌发了回国升学，投身伟大祖国建设的思想。

1952年6月4日，我高师毕业后，和一群爱国青年学生，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告别了亲友，离开了曾经养育我18年的第二故乡——“千岛之国”，乘着“芝旺玉”邮轮启程，回到了日夜向往的伟大祖国。同年10月，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历史系。在四年美好、幸福、快乐的大学学习和生活中，我深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体会到党和人民对归侨学生的关心、照顾和培养；更重要的是，通过四年的学习和社会实践，不仅学到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理论，提高了思想觉悟，而且把认识水平升华到理论高度，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光明前景，从而坚定了我永远跟着党走，毕生献身于社会主

义事业的信念和决心。

1956年7月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打倒四人帮后，1979年3月23日提升为讲师，1983年4月，提升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4月，当我迈入50周岁时，加入了中国致公党，成为民主党派的一个成员。当时想法很简单，总觉得年过半百的人，政治上需要有个归属，考虑到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上层人士组成的一个民主党派，自己作为一个归侨知识分子，加入致公党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1984年6月，北京市海淀区举行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北京师范大学是个选区，需选出三位人民代表，学生、教师、工会各选一位代表。当时，我被推举为教师代表，选举结果，我以相当高的票数当选。1984年8月13日—19日，海淀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幕，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心情十分激动。

1984年9月8日，成立了中国致公党北京师范大学临时支部。经过致公党北京师范大学几年的发展，成立支部的条件成熟了。1986年9月27日，中国致公党北师大支部正式成立了。那一天，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伍禅、致公党北京市委负责人蔡其侃、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任宁芬、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胡恒立，副校长王振稼、统战部长彭勃，还有各兄弟党派的代表、侨联的代表、《华声报》的记者等共四十多人，可以说盛况空前。

1985年9月，报考我的专业“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研究生，有三名被录取，两名是历史系的应届毕业生，一名是山东考进来的，三名都是女生。之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生上，一边要给她们上课，一边还要指导她们看书、学习。1986年夏天，全系评选先进工作者，这是我第二次当选，第一次是1984年。同年11月，由于系务工作繁忙，系总支委员会和系务会议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增选一位副系主任。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增补我为副系主任。

1986年10月，一次致公党中央召开有关修改《党章》的座谈会，我发了言，很有质量，引起致公党中央的重视和注意。以后的几次有关座谈会，

我还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准备，于是，致公党中央领导人有意调我来中央工作。中央主席会议决定：

“通过师大统战部寻问一下，吴豪德同志是否愿意调来致公党中央来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待遇是副局级。”一天下午，师大统战部部长彭勃找我谈话，把上述意见谈了一下，并说：“致公党中央缺乏干部，特别是知识层次高的干部，你回去考虑一下，给我回话。”

我回到家里以后，这一席话的滋味还真值得我咂摸咂摸的呢。想了又想，还和家里人商量。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去，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于是，找了统战部部长彭勃谈了，同意去！致公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人多方考查，跟考试差不多，没有想到，到50多岁时还要来这么折腾。致公党北京市委会的主任委员郑正仁、副主任委员栗秀玉亲自到家里来谈情况，认真地说：“要好好考虑，这等于放弃自己的专业。”过一段时间，致公党中央派一位副主席陆榕树和中共党支部书记王大平（后改名张骏升），到师大统战部来考核。甚至惊动了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亲自参加致公党北京师范大学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实际是考察我的人品和能力。

1987年6月6日，86岁高龄的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在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栗秀玉教授陪同下，冒着初夏的炎热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致公党北京师范大学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一次考察，看看我的人品和能力，也是主席亲自下到基层来了解下情。黄老回去以后，对师范大学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吴豪德的工作能力和表现表示满意。经过轮番的严格考察，我算合格了。

1987年8月24日—31日，应邀列席致公党中央召开的第八届中常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会议闭幕后，临走之时，我和蔡祝生前去拜见了董寅初常务副主席，我们意识到董寅初是下一届主席接班人，他说了算！我们说明来意之后，董寅初大哥接着说：

“你们来，我欢迎！不过，你们是黄鼎臣要来的，我，我没有要过。这样吧，你们刚参加完这个会，回去写个体会或感想给我，两个礼拜交卷。”这是

调我们进机关前的一次大考验。很明显，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必须重新审核！于是，我于9月15日写了《关于加强致公党建设的几点建议》，这份材料交给了董寅初。他阅后，表示满意。

1988年1月17日，我由致公党北京市委推荐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委员，为期五年。1月17日—25日，参加北京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心情很激动，也感到很自豪。1988年5月份，我向系里提出申请提升教授的要求，提交了三篇论文。1988年6月24日，系和校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主要是自己基本条件够了。

1988年初，调我到致公党中央工作，开始了从未想过的从政生涯。最初任组织部副部长，没多久，升任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后又任命为副秘书长，经常和主席、副主席出席各种会议，或代表致公党发言等。1988年12月12日，召开中国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为大会起草《中国致公党章程》和关于修改《中国致公党章程（草案）的说明》，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补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88年底，“九大”通过的新《章程》指出：“中国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总堂发起，于1925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有鉴于此，致公党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这二者有着历史渊源，要讲清致公党的历史，就必须探讨与研究洪门的历史，寻觅其根源。这时期，我大量收集和编写关于洪门、致公堂的文章，试图说明致公党和致公堂的关系，讲明这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

1991年3月20日，几经周折，交给我全国政协办公厅的《通知》，上面写道：吴豪德同志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于3月22日前到政协全国委员会会务组报到，特此通知。我参加了当年（最后两年）的会议。

1992年3月19日，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五次会议开幕。中午，吃过午饭，准备午休时，突然来了个电话找我，他说：“我是秘书处的”，“找你商量点事，就是我们想让你在大会上发言，是代表你个人，你把书面发言稿《殷望社会各界关心海外学子》念念，我们觉得你的稿子写的不错，有一定的代表

性，况且目前是个热门问题”。他说：“不用考虑了，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还要安排呢。”我说：“好吧！”我的大会发言问题就这样定下来了。

3月27日下午，我上台发言了，我念的速度适中，注意感情和表态，我在规定时间内讲完了，博得一片掌声。在我讲的过程中，白纲（当时派去的干部）给我照了几张相。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当吃晚饭时，许多熟人（其他党派的人）碰到我都说：你的发言很好，下了功夫啊，替海外学子讲话，表达了我们的心情！当晚，电视简要播放了当天大会的新闻。

同日，首都各大报纸刊登了昨天的新闻，《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华声报》《中国新闻》进行了类似的报道。《人民政协报》（不是日报，一周出版两次）、美国《侨报》和香港《明报》较详细报道了我的发言。一个简短的发言影响如此巨大，不仅国内的报纸，连香港、美国的报纸都刊登，实属本人的意料之外，真没有想到。

1992年9月29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为尽快成立出版社，开展有关出版业务，会议决定：

- （1）杨纪珂同志兼任出版社社长；
- （2）吴豪德同志兼任出版社总编；
- （3）汪明华同志担任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具体负责筹办出版社工作；
- （4）定期向主席办公会议汇报筹办出版社工作的进展情况。

1992年12月15日，召开中国致公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仍为大会起草《中国致公党章程》和关于《中国致公党章程（修改草）的说明》，会议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

1993年2月19日，我收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寄来的一封公函，写道：吴豪德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协商决定：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1993

年2月19日。

收到这封公函，我心里十分庆幸，我又一次当上政协委员。在当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时，我每年参会时都得写一篇书面发言，发表对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发挥一个政协委员的作用。

1995年4月21日，召开了第十届第十一次主席办公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关于编撰致公党历史问题，指出：“会议认为，这是本党的一件大事，要组织抓紧工作，宜早不宜晚。第一步，成立致公党党史编写小组，由陆榕树同志牵头，吴豪德同志具体组织编写。小组人选应尽早提出，报主席会议定；第二步，搞好材料的搜集工作，把历史事件、人物搞清楚；第三步，研究汇总材料，编撰成书，力争用一年时间完成。”

我们成立了致公党党史编写小组，小组成员足迹踏遍了南京、广州、惠州、昆明等地，访问了致公党的领导、老前辈，到南京第二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等查找、翻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用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从1996年3月25日—1997年10月1日），通过小组编写、讨论、修改、党内外专家讨论、领导审批，共九易其稿，才得以出版《中国致公党简史》（初稿）。2003年9月，正式出版《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2），2010年9月，《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第二版正式出版，都是以《中国致公党简史》（初稿）为蓝本的。

1998年5月，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退休了。从1988年1月起至1998年5月整整十年，我为致公党奔忙、工作着，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一个参政党的一员，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问心无愧！

前言

1956年6月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因诸多原因，只参加过一些编写、编辑、编译工作。只有到“四人帮”倒台后，才有机会独立发表文章。

记得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讨论，它打开了人们的思路，严厉批判了长期横行我国的统治思想和理论的方法论，还原本来的简单的真理。

从1978年夏季起，我利用这股强劲的东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当时，师大开展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自己私下琢磨一些问题。想了半天，觉得在这几个问题上可以做文章，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争论，他们都曾错误地估计形势，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觉得配合唱起来，很有说服力。

于是，我动笔写了第一篇文章，专门论述爱尔兰的问题，题目是：《坚持用实践不断检验真理的一个范例——马克思为什么要修改爱尔兰问题的结论》，发表在《历史教学》，1979年，第3期；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马克思、恩格斯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学习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的科学态度》，（未发表，于1980年在北京市纪念恩格斯诞辰16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该文已丢失）。连续发表这几篇论文充分证明，我还是有能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

时过境迁，时代变了，自由的空气略有好转，对于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能发表自己的观点。接着，我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到后来刹不住了，一篇又一篇的发表。

我发表的文章，综合起来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探讨民族问题较多，包括被压迫民族的生存条件，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民族压迫和压迫民族的关系，如爱尔兰民族问题、印度尼西亚民族问题、越南民族问题等。

第二，讨论华侨问题，由于我世代是华侨出生，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里，经历过殖民压迫和欺凌，很自然地对华侨问题感兴趣。包括华侨的生存环境，华侨与祖国的关系，华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等。

第三，研究洪门、致公堂、致公党问题，这和后来我从事的事业有关。后期我到致公党中央机关工作，这引起了我对这项工作的兴趣。研究致公党工作，很自然地必须从它的源头谈起，所以必须从洪门、致公堂谈起。

第四，研究问题不囿于传统观点，喜欢从多种角度来考虑问题。从指导本科生、研究生毕业论文到探究民族、华侨、洪门等问题都是如此。

我编辑出版这个集子只是想把自己一生的写作做个小结，总结一下自己所写的文章，如果能启迪后人一点思考，那当然更好！

在收集和编辑这个集子中，我尽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和本人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和欠妥之处，敬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编：参加编写（辑）专著、译著、录制

编写（辑）专著工作	3
-----------------	---

第二编 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论文

坚持用实践不断检验真理的一个范例

——马克思为什么要修改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结论	9
-----------------------------	---

马克思、恩格斯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	17
----------------------------	----

第一国际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28
----------------------	----

1848 年欧洲革命	47
------------------	----

论爱尔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61
--------------------	----

浅析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68
----------------------------	----

印度尼西亚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	74
----------------------	----

日俄战争与亚洲民族主义的勃兴

——兼论日本亚洲政策的一个方面	88
-----------------------	----

第三编 在致公党发表的论文

党指引我走上革命的征程	107
-------------------	-----

“七一” 华诞话初衷	112
------------------	-----

致力为公的楷模

——黄鼎老参加北师大支部生活的片断	114
大家都来讲真话	117
喜看民主党派史教育的基础建设	119
华侨捐资助学与法制建设	121
学校应明文规定学生不得向教师送礼	125
加拿大华人社团围绕人头税补偿问题的争论	127
加强侨情研究，做好海外联谊工作	131
1945：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始末	136
华侨有功革命	
——华侨、洪门致公堂爱国人士支援革命事述略	139
南洋华侨机工抗战史述略	143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记陈嘉庚在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的避战匿居经历	156
爱国华侨司徒美堂传奇	167
司徒美堂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若干意见	180
致公党中央创办《公论》杂志的前后	184
中国致公党如何切断与海外组织的关系	195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何出现主席团制？	202
浅析洪门致公堂同中国致公党的关系与区别	206
中国致公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	
——纪念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五十周年	218

第四编 在致公党发表有关洪门、致公堂等的论文

“洪门”名称的五种说法	227
洪门团体为何信守“三大信条”	229
洪门为何忌讳“七”字	232
洪门组织的誓词——“三十六誓”	235